

前言

白吉爾 (Marie-Claire Bergère)

本書全面比較蘇聯和中國的革命。對這兩個革命的某些方面進行比較或加以批判的研究早已數不勝數，但畢仰高 (Lucien Bianco) 的這本書脫穎而出，提供了全面的透視和總結。畢仰高分析了兩個革命的性質、它們不同的根源和最初的目標、革命軌跡的匯合以及革命的後果。這裏需要解決的問題不是兩個革命中哪一個最好地體現（或者扭曲和背棄）了共產主義的教條，而是要比較發動革命的原因和革命發展的階段，評估革命的後果。廣而言之，研究的目的是思考兩個革命在二十世紀歷史中的作用以及它們對人類社會進步作出的正面和反面的貢獻。英語讀者可能不太習慣這種歷史的和人文的研究取向，因為他們比較習慣於專題研究和理論研究；也可能懷疑這是一本法國式的聲稱具有普遍意義的著作，難免都是泛泛而談的膚淺結論。他們可能過慮了！這本書比任何其他著作更基於事實，更接近真實情況。作者的卓識遠見把讀者從深刻的分析帶入宏觀的視野。

畢仰高畢業於巴黎高等師範學院，這是法國幾十年來專門培養知識分子精英的高等學府。他在那裏接受了嚴格的古典教育，但有一段時間不能決定是選擇歷史還是哲學作為他的專業。他最後選擇了歷史，但對哲學始終沒有忘情，終於把深入專題研究與真正從哲學觀點了解歷史成功地結合在一起。

當然，本書的內容並不是完全根據作者自己的基本研究。不過，畢仰高浸淫於中國近代史 60 年，已經由孜孜不倦的讀者成為一個博覽群書的學者，能夠把現代中國問題的研究成果內化為自己論證的基礎。

中國自1978年改革以來，開放了部分檔案，歷史學研究在中國和西方取得了巨大成就，再加上個人的敘述比比皆是，都成為畢仰高吸收的豐富營養。

畢仰高不懂俄文，因此對俄羅斯並不熟悉，但是他花了多年時間閱讀莫斯科出版的翻譯文檔以及西方學者關於俄國革命的研究。矛盾的是，由於關於俄國革命的歷史文檔遠多於關於中國的文檔，他在一些章節中關於俄國的知識也多於關於中國的知識（例如關於古拉格和勞改營的比較）。畢仰高關於中國的新歷史領域進行基本研究，就此取得的專門知識獲得蘇聯問題專家們的公認。因此，他在進行比較時並不需要尋求蘇聯問題專家的協助，從而避免了集體合作的通病，把平行的情況不適當地連接在一起。這本書前後一貫，採取了動態比較兩個革命的架構。畢仰高本着獨立公正的精神，以他自己的研究成果為根據，不追隨意識形態的風尚，不受政治壓力的影響。他是少數幾位首先譴責毛澤東騙術的學者，也首先抨擊一些人在六十和七十年代對蘇聯的幻想破滅之後又轉而寄希望於中國。本書是一位廣博明智、學養深厚的歷史學家的反思結晶，促使讀者對許多公認的真理提出質疑。

《歷史的覆轍》呈現出兩個革命不同時期的全景繪圖：布爾什維克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的勝利（1917–1953），比毛主義的勝利（1949–1976）早了30年。全書的主要論點就是印在書的前面兩頁、馬克思所引述的黑格爾警句，講述一個悲劇的歷史覆轍。誠然，作者認為中國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俄國革命的啟發，也就是說重複了其過錯和罪行。中國革命並非自己獨創，它複製了俄國在經濟現代化和社會公正方面的錯誤和失敗。作者用前面九章來闡述這個論點。

第一章〈落後者〉開門見山，比較兩個國家的革命前狀態，它們與西方國家相比在經濟上和其他方面都遠為落後（中國落後得更多），差別在於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高漲，而俄國更多關注社會問題，懷着對理想世界和新人類的憧憬。最後，對外戰爭對取得政權扮演了關鍵作用（俄國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國是1937年日本入侵）。這項比較按不同題目進行，既很深刻，也有精彩的總結。

第二章〈迎頭趕上〉主要討論兩個政權都優先關注的經濟，第三章〈政治〉指出兩國的共同淵源是列寧。第四章〈農民〉和第五章〈饑荒〉則是全書最有獨創性的精彩部分。畢仰高花了50多年時間，主要研究農村問題。農民對兩國革命來說，都是一個無法解決的挑戰，這方面的失敗嚴重影響到革命的結果。對俄國革命黨人來說，農民永遠是個無法解決的難題。強迫集體化政策和去富農化帶來1932至1933年的大饑荒，造成農業生產停滯，農民成為工業化和城市化祭壇上的犧牲品。

中國的領導人雖然與農村較為接近，他們的農業政策給農民造成的禍害絕不比蘇聯的革命前輩少。1949年以後，中共沒收了富農的土地，予以重新分配，但兩、三年之後開始了強迫集體化。中國同蘇聯一樣，依靠農村剩餘資金來優先發展工業，犧牲農民，使他們成為名副其實的「資本原始積累的奴隸」。畢仰高接着打破了毛澤東的革命是農民革命的神話。中國農民是在抗日戰爭中被動員起來的，對中共的奪取權力作出了貢獻，但他們在革命鬥爭中從來沒有發揮過領導、甚至獨立的作用。新中國成立後，也沒有優先改善農民的生活。1958年毛澤東發起的大躍進體現了「中國道路」和共產主義烏托邦，實際上不過是發揮到極致的激進集體化，隨即直接造成大饑荒。

蘇聯1931至1933年的饑荒造成600萬至700萬人死亡，大躍進帶來的饑荒造成2,000萬至4,000萬人死亡。畢仰高並沒有忽略造成饑荒的結構因素，例如兩國都受氣候變化或人口轉型的影響，但是他明白指出，兩個當權的革命政府實施的農業政策才是產生饑荒的主要原因。他還指出斯大林必須承擔的個人責任，因為他利用對農民的鬥爭消除了所有的反對派系；毛澤東的責任則是他被自己的烏托邦願景和自以為是沖昏了頭腦。

第六章告訴我們，兩個政權出現的官僚體系和「新階級」具有相似的社會學基礎和行為模式。他們同樣享有特權，腐化墮落。但兩個獨裁者對他們的態度稍有不同：斯大林願意接受他們，因為對他們的俯首聽命和社會保守主義感到滿意；毛澤東一再攻擊新的資產階級及其「工作風」，但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又很快把權力交給了這些人。

第七章談文化問題，蘇聯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都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控制之下，動輒受到批判和壓制。不過，蘇聯知識分子的反抗比較激烈，中國知識分子的反應是鴉雀無聲。

最後，第八章比較了蘇聯的古拉格和中國的勞改，前者是後者的範本。中國特別強調犯人的精神轉換和思想改造，使得勞改不僅與古拉格一樣殘酷，而且更叫人毛骨悚然。

第九章比較斯大林和毛澤東兩個「魔王」，發人深省。這兩個人是同樣的制度塑造出來的獨裁者，但由於性格不同，導致不同的統治方法。斯大林講求實際，冷酷無情又有條不紊地消滅了他所有真正的和可能的對手。毛澤東是不動感情地殘酷，他也比較不那麼關注當初參加革命的初衷是要發展中國的經濟。

本書不僅是學術著作，而且讀起來津津有味。讀過畢仰高著作的人都會記得他那活潑典雅的文筆。令人尤其印象深刻的是他對人性的深刻關注。他用生動有趣的講述方式來闡明他的主要論點。他真心關懷個人的命運和受害者的未來。他沒有感情用事，但對於冰冷統計數字背後的個人遭遇感同身受。

這本書必將成為二十一世紀歷史學的新紀元。畢仰高拒絕讓意識形態扭曲歷史，但也不贊成當代歷史常見的那種零散瑣碎的研究方式。他敢於回顧前幾個世代面對的廣闊視野和主要問題，思想開放，知識豐富。他實事求是，但與科學家不一樣。畢仰高是一個有政治原則的歷史學家，毫無顧忌地說出自己的價值判斷，不怕他的結論會得罪甚麼人。不！他認為所謂的中國道路不是毛澤東獨創的，儘管有些人因為對共產主義失望，轉而寄希望於毛主義。他認為毛澤東建立的政權像是蘇聯政權的「兄弟」，但不是孿生兄弟。中國革命只是歷史的覆轍，重複犯下蘇聯革命的錯誤和罪行。兩個革命都沒有實現其宣稱的社會公正。至於經濟現代化，斯大林「在相當程度上」做到了，蘇聯比中國做得更成功，但兩國的全面經濟增長仍然落後於西方。這些負面的評價會使少數一些眷戀往事的人大失所望，讓他們只能從懷念偉大舵手和小紅書那裏尋找慰藉。

另一方面，一些歷史學家會感到驚訝，因為作者處理意識形態的態度太過謹慎，似乎過度低估了意識形態的作用。確實如此，全書沒有為意識形態專列一章，儘管意識形態在兩個共產政權的建立和統治中佔據着重要地位。這種謹慎的態度在最後一章和畢仰高關於毛澤東的描述中尤為明顯。作者認為，斯大林的大清洗是一個「社會工程」操作，暴露了獨裁者的動機，而毛澤東不同，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是基於意識形態考量，有些人可能會堅信不疑。毛澤東不像斯大林，掌握大權不是他唯一的目的，他還堅持要繼續革命。可是，全面比較兩個革命並列出其相似處之後，往往會沖淡毛澤東夢想中的烏托邦色彩。毛澤東主要呈現的形象是一個師心自用、玩弄權術的魔王。有些人一方面承認毛澤東的烏托邦狂熱不能成為暴政的藉口，卻又給他披上人道和理想主義的斗篷；畢仰高顯然與他們是不相為謀的。

這本書從頭到尾譴責宣傳製造的幻想，拒絕用教條取代事實，用信仰代替理性。不僅如此，他還總結二十世紀兩大革命失敗的教訓，認為革命與暴政之間存在着難以避免的關係，強調任何企圖解救人類苦難的革命都面臨意想不到的困難，幾乎無法克服。這種懷疑應該使我們更加努力，而不是讓我們沮喪氣餒。在我們這個「後真相」社會，我們以務實、有效的名義，而不是以光明未來的名義，相信最荒誕不經的謊言。這本書提醒我們，「如果我們不在乎甚麼是事實，不在乎甚麼是真、甚麼是假，如果我們不能分辨甚麼是真相、甚麼是宣傳，我們的麻煩就大了」（奧巴馬〔Barack Obama〕，美國前總統）。真理雖然很難確定，但是只有真理才能讓我們不再重蹈上個世紀極權主義的覆轍。